

成舍我先生文集

大陸篇・新聞事業

序一

居安思危的報人情懷

成思危

在父親成舍我逝世二十二週年之際，他所創辦的台灣世新大學決定出版《成舍我先生文集：大陸篇》，現任董事長嘉玲妹邀我儘快為其中的〈新聞事業〉作序。儘管我對新聞專業所知寥寥，但出於人子之責和兄妹之情，只能勉為其難地倉促命筆。

本集內主要包括父親於 1925 至 1949 年間在祖國大陸時，所發表有關新聞事業的文章及演講。這一時期的父親正值壯年，雄心勃勃，壯志滿懷。1924 年 4 月，他憑著僅有的 200 元大洋，在北平創辦獨立於軍閥豪門之外的《世界晚報》，此後他以自強不息的精神，筆路藍縷，披荊斬棘，陸續在北平創辦《世界日報》（1925 年 2 月）、《世界畫報》（1925 年 10 月）和「北平新聞專科學校」（1933 年 4 月），在南京創辦《民生報》（1927 年 4 月），在上海創辦《立報》（1935 年 9 月）。可以說我誕生的 1935 年是父親的新聞事業達到頂峰的一年，但當時他已經預感到日寇的狼子野心，國難臨近，遂以「居安思危」之意為我命名。1937 年抗日戰爭爆發以後，他毅然決然地拋棄了十多年來艱苦創業的成果，投身於抗日的洪流之中。1938 年 5 月，他發表著名的〈紙彈亦可殲敵〉一文，提出「抗戰宣傳應與軍事並重，動員民眾應先使報紙到鄉村去」，愛國之心溢於言表。

讀過這本文集後可以感到，父親不僅是一名優秀的新聞專才，也是一位善於創業的新聞企業家，還是一個熱心育才的新聞教育家。作為一名優秀的新聞專才，父親不僅思維敏銳，文筆犀利，而且一直執著地堅持自己對新聞事業的理念。我於 1999 年 9 月 2 日在昆明會見「第五屆海峽兩岸及港澳新聞研討會」人員時的講話中，曾根據父親的新聞理念提出對新聞工作者的四點期望。

一是振聾發聵。父親一貫主張報紙的大眾化和平民化，要讓大眾買得起、看得懂，使報紙真正走到民間去，才能發揮報紙喚起民眾的作用。他在 1935 年 11 月 14 日發表的〈報紙救國〉一文中指出：「我們必須藉著報紙的力量使每一個中國人，都知道國家和個人，是一而二，二而一……。至於國家領土，若是遇到異族的侵略，那麼，佔去了國家的一寸土，就等於各人自己的一間屋、一畝田被人霸佔了一樣，只要有一分力量，子子孫孫，總不肯善罷甘休。人人如果都有這樣國事等於家事的精神，豈但目前的內憂外患，不成問題，就是整個中華民國被人家征服了，我們也自有光復舊物，還我河山的一天。」

二是棄舊圖新。父親一方面非常重視研究吸收國際新聞事業發展中的好經驗，並結合中國的實際加以選擇和運用。從本文中可以看到，他不僅認真地考察英國、法國、比利時和美國的新聞事業，還研究過德國新聞事業的情況，並提出自己的見解。另一方面，父親也非常重視科學技術在新聞事業中的作用。他在 1932 年 4 月 29 日所做的〈中國報紙的未來〉的演講中，指出無線電、飛機、電傳寫真等新技術在新聞事業中應用的前景，並預言歐美在十年左右，中國在三、五十年內就可以實現。

三是抑惡揚善。儘管父親曾因反暴政而被軍閥張宗昌抓補，差點就落得與邵飄萍、林白水一樣被槍斃的下場；也曾因反貪汙而得罪過汪精衛，被投入監獄 40 天，這些經歷也未能改變他剛直不阿、嫉惡如仇的性格。但是他對於反對軍閥段祺瑞的學生運動則大力支持，對於英年早逝的戈公振，他寫了一篇情真意切的悼念文章，稱戈公振為「一個真正的報人」。

四是務實求真。父親強調新聞記者的第一個信條就是「忠於職守」，保證報導的真實性。他曾多次訓誡記者在採訪時：「與其信用耳朵，不如信用眼睛。」對於捏造和歪曲事實的記者，他輕者嚴詞訓斥，眾者堅決開除。

作為一位善於創業的新聞企業家，父親用實踐證明他的經營管理能力，登上當時中國個人辦報成就的頂峰。他所提出的新聞企業經營管理的理念，有以下幾點值得稱道。

一是職工共有。父親在〈中國報紙之未來〉中提出，私人經營的報紙「其資本，惟以在報館工作者為限，自社長以至工人，均為主權者，均有分擔報館責任、分享報館利益之權，非工作人員不得坐分紅利。」

二是平等合作。父親提出：「應該設法使一個報館，成一個合作的集團。由排字工人，到社長止，都應該忠誠合作，全成報紙的主人，不但要消滅資本勞動兩階級的對立，並且要鎔和勞心勞力，使他們平等的成為一個報館的生產者，只應從他們的勞動時間和效率，去區別他們的報酬，而不應該從勞心勞力上有所歧視。」

三是言論獨立。父親堅決反對報紙受大資本家控制而主導言論為其利益服務，也反對報紙為追求銷路而過分地商業化，追求奇聞軼事，甚至誨淫誨盜。他主張「報紙在營業方面雖然還可以商業化，但編輯方面，卻應該絕對獨立，不受商業化絲毫的影響。」

四是精心管理。父親在新聞企業的管理上非常精心認真，不僅對每個崗位都嚴格要求，而且每天都要看當天出版的報紙，發現錯誤後嚴加批評和處置。在支出上嚴格控制成本，精打細算，以致有人譏笑他「小器」，但是他在購買設備上卻極力求新求優，顯得非常大方。

作為一個熱心育才的新聞教育家，他創辦《北平新聞專科學校》，並不斷探索實現其新聞教育理念的道路。

一是人才為本，父親認為新聞事業的發展，人才的準備尤為必要。他最初曾經設想在北平大學內設立新聞學系，但感到在大學中實驗他的新聞教育理念困難很多，而且直接招收大學生來訓練，不從根本著手將來也恐怕難見成效。於是他下決心自費創辦一所以合乎實用，循序漸進的新聞專科學校。即使在抗戰期間極為困難的條件下，他還曾於 1942 年在桂林恢復「北平新聞專科學校」（桂林分校），為大後方的新聞事業培養人才。

二是手腦並用。在 1935 年 4 月 11 日發表的〈我所理想的新聞教育〉一文中，他說：「我的原意，是想替今後中國新聞事業訓練一些手腦並用的小朋友……，他們將來的技能，是一方面穿上長衫，做經理，當編輯，一方面也可以換上短衣，到印刷工廠

中，去排字，鑄版，館機器。」

三是創新學制。他提出試驗的學制分為三個階段，第一階段為初級職業班，目的是培養印刷工人；第二階段是高級職業班，目的是培養中級管理人員；第三階段為本科，目的是培養高級管理人員。第一、二兩階段，各為兩年，第三階段三年。第一、二兩階段的畢業生可以升入下一階段深造，或直接參加工作。這樣的學制在當時確實是一種創新，即使在今天看來也有一定的參考價值。

四是學生辦報。父親主張在學校中創辦一個大眾化的報紙，各種職務均由學生自己擔任，給學生以實習的機會。

父親在 1933 年 4 月發表的〈如何使報紙向民間去〉一文明確昭示，他的理想就是要改革中國的新聞事業。但是由於客觀環境的限制，未能實現他的雄心壯志，他所提出的有些改革思路在逝世前也未能實現。但我深信他在這本文集中留下的寶貴思想和經驗，不僅進一步證明他在中國新聞事業中的歷史地位，在今天仍然會給人們以有益的參考和啟迪。

成思危

2013 年 7 月 16 日於北京

序二

歷久而彌新

成嘉玲

父親的辦報生涯始於 1924 年在北平創辦《世界晚報》，至 1988 年再以 91 歲高齡創辦台灣《立報》，前後兩份報紙相距超過一甲子的時間，他為新聞工作所付出的時間與精神，不但是中國近代史的唯一，衡諸世界各國恐怕也少見。但自 1952 年抵臺定居後，受限於法令，父親辦報的志向即難以施展，只能將心力投注於新聞人才的培育，在臺灣創辦當時唯一一所，集合民間人士而獨立經營的新聞學校。這段期間，若有餘力為文著述，也多以時局趨勢或教育政策為題，直到解嚴前後，才又闡述自己的新聞理念以及報業發展的藍圖。

父親生前常感嘆由於戰亂頻仍，早年所發表與新聞事業有關的文章已散佚難尋，許多當年被視為荒誕不經的識見：如 1930 年代即預言將來新聞採訪與報紙運輸勢必仰賴飛機，又如斷言「電傳寫真」（television）將改寫新聞工作的面貌等等，事後不但證明所言不虛，甚至早被當做了無新意般的老生常談。現在希望透過這本文集的出版，能夠稍稍彌補父親生前的遺憾。集子收錄的文章，以 1949 年前父親發表與新聞事業相關的文章為主，這是父親以報人身份縱橫大江南北、奔走廟堂草莽間的所思所想。這些文章不但具體呈現父親的新聞理念，也反映處於起步階段的中國

報業所面對的問題，更投射出一位深受五四思潮影響的知識份子，如何在各種極端思想：國族主義與自由主義、集體主義與個人主義之間，取得平衡的思想歷程，這當中尤以言論自由的討論最為明顯。

文集中最早一篇探討言論自由的文章發表於 1925 年，針對北京《晨報》遭民眾焚毀事件的社評。待北伐成功、全國統一繼而發生九一八事變後，國民政府以新聞統制之名行新聞檢查，箝制言論自由之舉，更多所批評。倘若僅著眼於此，就忽略父親在〈報學瑣談〉、〈新聞史料評述〉等專欄中，對一戰時期英美各國新聞管制政策的贊同。轉變的關鍵在中國的特殊國情，特別是大敵當前的嚴峻情勢下之不得不然，但這樣的贊同也並非毫無保留的。父親認為對新聞出版的檢查必須依法明文規定，更提醒政府必須審慎為之。這一立場，可以在對《新聞記者法》、《出版法》的評論中看到，乃至後來父親在臺灣以立法委員身分，對龔德柏、馬乘風、雷震等案的質詢，以及兩次反對《出版法》修正案的發言，也都是秉持此一立場，堅定地捍衛言論自由。對言論自由的堅持，替父親的一生招惹不少麻煩，不但因而多次入獄，更差點遭張宗昌毒手而遇害，報館不但屢被勒令休刊，停刊撤照的境遇更比比皆是。這些為文賈禍的經過：南京《民生報》是如何開罪汪兆銘、上海《立報》如何與日本軍國主義鬥爭，也可在文集所收錄的文章中一窺事件梗概。

在此一艱困情勢中，父親仍不斷地思考報紙該如何有助於國家發展，如何扮演大眾讀物、啟迪民智，而政府又該如何健全報業體制、鞏固民主。對這些問題的思考，早在 1930 年父親與程滄

波先生赴歐考察郵寄回國的稿件中，即可略見端倪。父親始終期待一份能夠監督政府、反映民意，但又不因資本利益而煽動、蠱惑的大眾報紙。當所有報紙都付之一炬，此一念頭依舊縈繞於心，並且提出：「資本家出錢，專家辦報，老百姓說話，政府認真扶助、依法管制」的制度設計。這個超越自由主義與威權主義的報業體制構思，比之於 1947 年美國新聞自由委員會（The Commission on Freedom of Press）在《自由且負責的報刊》一書中所提出的「社會責任論」，也毫不遜色。此一制度設計，終究因為戰亂而無法實現，但若思及當前臺灣混沌不明的傳媒環境與亂象，這個在半世紀前即提出的理想，或許仍舊有些參考價值。這些年世新大學的老師們，在台灣各中小學推動媒體素養，積極地教育民眾、縮短資訊落差；台灣《立報》與《四方報》對弱勢群體權益的維護與發聲，無非是延續老人家半世紀之前的遠見。

嘉玲有幸在父親友人與諸多前輩的信任下，接下世新大學這個棒子，因而對文集中談論新聞教育的文章特別有感。雖說現在世新大學的歷史起於 1956 年，但 1933 年於北京創辦的「北平新聞專科學校」更可視為世新的前身。父親當年在開學典禮上有這麼一段話：

世界上任何事情，都是新陳代謝，在座的諸位同學，雖然都還很年青，將來長大了都可以成一個完全手腦並用的新聞記者，或新聞事業的支配者。我們的事業將來就會要讓給你們去作。所以各位的希望和責任，都是重大而無窮的。

我這後人將這棒子接的是好或壞，只能留待他人評述，但對任何一位世新的同學與老師來說，無疑地也都是世新這歷史傳統的繼承人。如何將「德智兼修、手腦並用」的校訓身體力行，如何堅持理想、改革媒體環境，也是我們必須時刻思考與反省的課題。

這本文集從規劃、執行到出版，露茜妹在生前付出不少心力。2006年出版港臺篇文集後，露茜妹就著手進行大陸篇的蒐集工作，北京人民大學的方漢奇教授、曹晶晶女士、唐志宏先生，都為這本文集的前期蒐集籌備工作做出不少貢獻。羅曉南教授在露茜離去後，義無反顧地接手露茜遺留的工作，帶領紀念館同仁讓文集的編輯工作得以持續，同樣功不可沒。還有其他許多幫助找尋散佚各處文章的學界同仁，在此一併致謝。

成嘉玲

2013年9月6日台北木柵